

MENSCHEN UND MÄCHTE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著
隋亚琴等译



伟人与大国

同济大学出版社

MENSCHEN UND

MÄCHTE

【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著
隋亚琴等译

17709/15

Helmut Schmidt

伟人与大国

同济大学出版社

伟人与大国

MENSCHEN UND MÄCHTE

[联邦德国] 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隋亚琴 等 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印刷厂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82.6 千字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定价 9.80(平装)

16.00(精装)

书号 ISBN: 5608-0094-7/D·3

本书特由同济大学出版社音像部和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协作采用最新激光照排排字

内容提要

本书是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根据自己保留的笔记写成的,全书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书中,作者回顾了他作为总理与世界大国——苏联、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多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细节,披露了他对这些国家和人物的印象;精辟地分析了当今世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以及世界未来力量的对比。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作者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本书不仅对于从事外交、外经工作的人员和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人员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国际形势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亦具有可读性。

写在前面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联邦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于1918年12月23日生于德国汉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读于汉堡大学，194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担任过社会民主党副主席等重要职。1949年后供职于汉堡市政府，主持过经济、交通工作。后来当选为联邦议员，先后任国防部长和财经部长。勃兰特辞职后，他于1974年5月16日当选为联邦总理，1976年和1980年又连任联邦总理，1982年兼任外交部长，1982年10月1日下野。

施密特作为联邦总理，1975年10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首次访华，毛主席接见了，邓小平与他进行了会谈。1984年秋，他应邓小平的邀请再度访华，会见了邓小平和赵紫阳。1988年10月又一次来华，邓小平和李鹏会见了。

《伟人与大国》是施密特1987年用德文写成的，同年在西柏林出版。书中，作者回顾了他作为联邦总理与世界大国——苏联、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以及具有影响的人物多次会晤的情况和谈话的细节，披露了他对这些人物的印象。其中有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美国的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赵紫阳等。

全书主要由三大部份组成。作者评述了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阐明了他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上与这些国家首脑所持观点的异同。最后，在全书的结束语“一个欧洲人的结论”中，作者概括明了地阐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他认为，当今世界，政治上的大国是美国、苏联、中国，它们构成了世界政治军事三角；经济上的三强是美国、欧洲共同体、日本，它们构成了世界经济三角。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两个三角的交叉点是美国。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它将逐步参与世界经济活动；西欧联合起来，也有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未来的世界，可能由现在的两个三

角,变成两个四角。

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作者除给予肯定的评价外。也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他呼吁,西方为自身利益计,应该支持中国的改革。

作者于1987年12月把本书德文原著寄赠给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题研究所,该所组织了同济大学部份德语教师翻译此书。由于本书涉及到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名胜古迹等多方面的内容,原著无注释,译者为便于读者理解,在一些地方作了注释,特此说明。注释参考的书目主要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世界知识年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1986)、《国际时事百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苏联人物》上、中、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德国袖珍百科全书》(dtv-Lexikon)(慕尼黑,1980)、《百科知识》(Universal Wissen)(慕尼黑,1985),等。

在译文处理上,我们注重忠实于原著,力求表达出作者观点论断的尺寸和口气。除对原著中个别印刷错误做了改正和删去了一张作者周游世界的路线图和时刻表之外,其他未作任何内容上的增减。

参加翻译工作的人员有:

尚祥华: 1—1.5

周恒祥: 1.6—1.10

李建民: 2—2.4, 2.7—2.9

梁 镛: 2.5—2.6

贾慧蝶: 2.10—2.12, 3.8

袁 杰: 2.13—2.15

隋亚琴: 前言, 3—3.7, 一个欧洲人的结论

全书由隋亚琴统稿、校译,肖友瑟、蔡仲德审阅。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林尔康教授、彼得·卡尼西乌斯博士(Dr. Peter Canisius)、潘其昌和联邦德国研究所全体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帮助,也得到了施密特办公室和《时代》周刊(联邦德国)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译文会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88年12月

前言

本书记叙了我与苏联、美国、中国三个世界大国的接触情况，有回忆也有评述。我无意把它写成一部自传，因为自传体的特点导致作者把自己看成完人，或者竭力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高于将来的历史评价。所以，我对政治形象自我塑造，始终持保留态度。然而，政治家、艺术家的回忆录却常使我感兴趣，它促使我思考，促使我批判地检验、补充或纠正原有的看法。

在下面的三大部分中，我记叙了自己对俄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印象，特别是对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了解。对于那些曾经涉及到——今天有的依然涉及到——我的国家或我本人的问题，我尽量做到既阐明他们的观点，也阐明我的观点。个别地方难免有重复，两次阐述同一题目的情况也是有的，因为有些事情对于诸如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样重要。

我在联邦政府工作的那些年，人际交往和政治接触犹如一个绚丽的万花筒，接触过的人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有艺术家和科学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人们常描绘政治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的孤单寂寞，然而这只是实际情况的一个侧面。我在政府工作的那些年，确实曾与许多人结下了友谊，也不乏真诚的合作。

目前，这三个世界大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有的甚至是震撼人心的转折。它表明应该从德国利益出发去描述和评论那些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华盛顿、北京已经结束或将要结束的时代。这三个大国内的变化是否确将给世界带来明显的变化，目前尚不得而知。戈尔巴乔夫的成就是否能持久彻底，其前景如何，我心中无数。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限制军备条约及均势协定的前景显然受里根势力的下降和他任期即将结束的影响。他的继任者将难以成为一位具有世界经验的战略家，因为除了尚未完成的外交任务之外，他面临的主要是美国巨额外债带来的问题。在北京，邓小平威望很高，但他

年事已高，改革路线是否能持久，对此他施加影响的时间不多了。对世界政治影响日渐增大的国家不是经济巨人日本，而是暂时在世界经济中无足轻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它未来的路线还不清楚。谁想预计未来，谁就必须认清主宰当今世界的因素。至于这些因素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未来，他只能推想了。

我不想用自我经历撰写一部所处时代的世界史，更多的是想把我自以为从国外对话者那里学到的或者理解了的东西告诉人们。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不以官方文件或(在此期间已公开的)档案为据，也不取对话者的出版物。我不是历史学家，书中所述对话和分析皆以自己保留的笔记为据。笔者无意以此展现一幅客观的历史画卷，倒是想告诉读者自己有过的印象，那些印象曾是或曾自以为应该是我那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还有我当时新获得的印象和作出的判断。

否认我的主观性或排除我的德国人身份，排除我的社会民主党人身份，都是不自然的。本书是一个打上个人烙印的报告，他生于一次大战末，青年时期由于父母之故未成为纳粹分子；然而，作为一名二次大战中的义务兵，他认为应该履行高于一切的爱国义务；他26岁时作为战俘，在许多老同志的积极影响下，成为了社会民主党人，又在一生的较晚时期由于西方盟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帮助，第一次经历了民主，这本书再现了他的见识和他的经验。

康德的绝对命令和马克·奥勒留^①的自省观对我的影响比拉萨尔、恩格斯或马克思大。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同志和老朋友：马克斯·布劳尔、威廉·凯逊、恩斯特·罗伊特、赫伯特·魏希曼，他们是具有国际事务经验的市长，还有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

^① 马克·奥勒留(Marc Aurel, 121—180)：古罗马皇帝，公元161年—180年在位，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认为神是万物的始基，叫人背弃外部世界，沉湎于内在体验的主观世界。行军中写成“自省录”12篇。

领导人弗里茨·埃勒、卡洛·施密德、赫伯特·魏纳，他们都曾在对外政策方面指导过我。我在经济方面的学识主要得益于海因里希·戴斯特、卡尔·克拉逊、阿莱克斯·默勒和卡尔·席勒。我要补充的是在企业界和工会里，在科技界和出版界，在官员和士兵中，在我那个时期的联邦议会其他党团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都有一些女士和先生对我的判断和行为产生过影响。

外国的榜样和先例也对我有过很大的影响。50年代后半期，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无足轻重的议员——当时在汉堡是亲英的——踏上了国际舞台；50年代末，我越来越明白了，我们的命运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是如何紧密相连；60年代，我认识到德法友谊是欧洲和平秩序必不可少条件。那些年，和平秩序对于我曾是最重要的大事。

公元头10个世纪，历史安排德国人民在欧洲中部发展。与欧洲许多国家人民不同的是，德国人民不是生活在岛上或半岛上，也不是生活在自然屏障之后，而是生活在一片开启的、平坦的、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土上。与我们德国人为邻的民族很多，数量居于欧洲之首。世界上充其量只有俄国和中国有这么多的邻国。只是它们都是大国，德国却是小国，而今天德国民族又被分裂了，这是由希特勒一手发动并彻底失败的那场战争的结果。奥斯威辛^①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将在我们邻居的心里投下阴影，后辈德国人所做的一切都笼罩在这个阴影之下。

我曾一直相信自决是每个民族的天然权利。假如在下一个世纪中有一天我们德国人又要走到一起了，那一定不能为此违逆我们邻国的意志，不能没有邻国对德国人意愿的信任，不能没有他们对德

^① 奥斯威辛(Auschwitz)，波兰的一个城市，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于1940年在这里建立了集中营，大批屠杀人民。据估计，在此惨遭杀害的人约250~400万，其中多数是犹太人。

国人长期维护睦邻友好关系的能力的信任。

如果说德国人与俄国人之间距友好的、互相信任的邻国关系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话，这并不只是我们单方面的过错。不仅是我们德国人，欧洲许多民族，特别是东欧人民，都感到苏联占领欧洲东半部是对自己的威胁。苏联的扩张性防御及向世界渗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做法，造成了不安全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西欧与北美结成了大西洋联盟。反过来，某些俄国人同样感到受到了威胁，这是不公正的，至少他们把德国看成是可能的危险发源地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完全理解苏俄人，因为他们在希特勒发动的那场战争中失去了2000万人，苏联人民也像我们一样希望和平，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有这个愿望。

面对潜在的威胁，我们德国人需要与美利坚合众国、与我们的西欧朋友、与其他民主制度国家结成同盟，同时我们还必须努力与苏联人、波兰人和这个大陆东半部的其他邻近的民族友好相处。这项双重性的任务十分艰巨。坚定地去完成这项任务，常会引起别人对我们德国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时而来自东方，时而来自西方，关于这一点书中也有描述。

70年代初以来，联邦德国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侏儒。我们6000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发展了国民经济，使之加入了世界上强大的最有效率的行列，而且在70年代又学会了根据自己的分量和所处的地理历史环境，在国际事务中起一定的政治作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地理上不与我们接壤的国家，都曾帮助过我们。反过来，他们也得到了我们的帮助。

我在三十多年的议会政治生涯中——8年多为总理，13年在联邦政府中工作——一直致力于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今天这项工作依然繁重，每一代面临的问题又都不同。和平的建立并非一劳永逸，必须不断地添砖铺瓦。我曾把为了我那一代人的和平而奋斗视为自己头等的重要的义务。我知道，我的边界那边的对话者并

没有认为他们的任务与此有多大不同。然而，利益上的磨擦、错误解释自己的和他人的利益以及国内政治上的束缚，还是一再使局势紧张。所以，了解它国人民和它国政府的利益、忧虑和希望，是很有必要的。持敌视态度者，不能维护和平。不与人交谈不听人叙述者，不能理解别人。本书首先是世界大国首脑谈话的产物，我感谢他们。

我还要衷心感谢在修改手稿中帮助过我的几个人，他们是库尔特·贝克尔、维利·贝克汉、克劳斯·伯林、格尔德·布策乌斯、延斯·菲舍尔、曼弗雷德·朗施泰因、露特·洛阿、汉斯·马特赫费尔、洛塔尔·吕尔、欧根·萨尔布曼、曼弗雷德·许勒、霍斯特·舒尔曼、瓦尔特·施蒂茨勒和我的夫人，感谢他们的建议和批评。并非所有的批评我都接受了，回忆和评论中的错误和缺点由我本人负责。

本书的撰写工作始于1984年，由于有其他日常工作，直到今日才完稿。我希望还能有足够的时间把我对欧洲国家及其首脑的印象写成一本书，主要写法国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

赫尔穆特·施密特
汉堡，1987年4月

目次

写在前面

前言

与俄国人相处

第一次会见勃列日涅夫(1973年5月) • 交流对战争的痛苦回忆 • 到苏联旅游度假(1966年夏天) • 关于波恩和莫斯科之间是否有可能关系正常化的试探性会谈(1969年夏天) • 赫伯特 • 魏纳对波恩的东方政策起的重要作有

1.1 俄国——苏联的延续性 16

俄国——苏联的扩张欲 • 帝国主义和意识形态 • 苏联领导的自卑感和安全忧虑症

1.2 苏联的战略和德国的利益 28

分裂的德国 • 门闩地位 • 波恩为中欧关系正常化作出贡献的界限和可能性 • 通向俄国文化的桥梁 • 阿登纳和哈尔斯坦主义 • 勃兰特的突破 • 70年代初苏联开放政策的动机

1.3 第一次访问勃列日涅夫

38

“隆重的欢迎” • 克里姆林宫的富丽堂皇 • 第一次交换意见
• 关于柏林的争执 • 葛罗米柯的坚韧、顽强 • 在一次两人单独
会谈中勃列日涅夫作了让步 • 勃列日涅夫对继续推行缓和政
策的特殊兴趣 • 第一次提及中程导弹领域中特殊的不均衡
• 与中国的不和 • 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 没有女士参加的记
者招待会

1.4 1974年—1978年期间的活动

59

1975年夏天的赫尔辛基会议是缓和阶段的顶峰 • 柯西金和吉
洪诺夫 • 德苏经济交流 • 安德烈·葛罗米柯 • 勃列日涅夫希望
直接联系 • 勃列日涅夫对卡特越来越恼火 • 维也纳中欧裁军
谈判

1.5 勃列日涅夫在朗根霍恩

75

一个新问题:SS-20导弹 • 在居姆尼希宫的交谈(1978年5
月5日) • 我向勃列日涅夫阐明我对新导弹的忧虑 • 在冷静、
实事求是的情况下气氛依然友好 • 在我汉堡的家中无拘无束
的聚会

1.6 政治局修正立场

85

走向“双重决定” • 中途停留于莫斯科(1979年6月25日)
• 威胁和引诱 • 葛罗米柯访问波恩(1979年11月23日) • 不知所措 • 苏联入侵阿富汗 • 愤怒浪潮 • 贸易禁运和抵制奥运会 • 我坚持计划访问莫斯科 • 德国的结盟笃志 • 阿富汗问题
• 我的发言惹恼了政治局 • 访问留比诺德军士兵公墓 • 苏联人让步 • 与乌斯季诺夫及奥加尔科夫的会谈

1.7 老人统治的结束

111

与勃列日涅夫的最后一次会见(波恩,1981年11月) • 对里根的不满 • 1982年后联邦政府在外交上丧失地位 • 戈尔巴乔夫批评勃列日涅夫时代

1.8 戈尔巴乔夫能彻底改革吗?

118

吸引观众的能力 • 第13个五年计划成功的前提 • 来自许多层次的阻力 • 苏联的贸易结算 • 在雷克雅未克犯下的错误 • 缩减军备开支是经济成功的前提

1.9 通过条约削减军备——历史性的机遇

127

一次个人的胜利 • 西方对“双零点方案”的保留 • 其理由经不起细加推敲 • “灵活反应”战略的重大缺陷

1.10 睦邻关系

130

军事均势是良好睦邻关系的前提 • 戈尔巴乔夫带来变动 • 处于忧虑和希望之间的东欧 • 葛罗米柯满怀信心 • “欧洲共同之家”

美国——作世界大国之难

德美关系的持久性 • 卡特和里根对欧洲利益的忽视 • 美利坚民族的勃勃生气 • 发生意见分歧的三个范畴

2.1 对美国的最初印象

146

学童时期的回忆 • 战争及其后果 • 带来关心和友情的包裹与马歇尔计划 • 我的首次美国之行(1950年) • 拜访德卢斯市的亲戚 • 新老朋友 • 对美国一流记者的尊敬

2.2 肯尼迪之星

162

迷人的就职演说 • 解决古巴危机 • 肯尼迪遇害引起的震惊

2.3 约翰逊推翻艾哈德 165

幻想的破灭 • 关于多边核力量计划的争论 • 所谓外汇平衡问题 • 艾哈德的挫折 •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2.4 尼克松——均势战略 171

在尼克松那里用早餐(1969年11月) • 一位高级战略家 • 取消普遍义务兵役制 • 梅尔文·莱尔德 • 破坏勃兰特的东方政策

2.5 第一次美元危机 180

阿瑟·伯恩斯 •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 图书馆小组 • 保罗·沃尔克 • 汇率的放开 • 美国失去了在货币政策方面的领导权 • 乔治·舒尔茨 • 世界经济的结构危机开始形成

2.6 与杰拉尔德·福特的友谊 195

“福特真有胆量” • 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局势发展的意见分歧 • 中欧裁军谈判和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第二阶段谈判 • 福特访问波恩(1975年7月) • 赫尔辛基 • 首届世界经济首脑会议 • 西方在步调一致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 中止承担驻军费用 • 纽约市的财政危机 • 向福特和基辛格告别